

第八屆

宋代文學
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王利民 武海軍 ◆ 主編



中山大學出版社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第八屆

宋代文學
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王利民 武海軍 ◆ 主編



中山大學出版社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 廣州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第八届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王利民, 武海军主编.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5. 9

ISBN 978 - 7 - 306 - 05441 - 8

I. ①第… II. ①王… ②武… III.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宋代—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I206.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20412 号

出版人: 徐 劲

策划编辑: 丁 俭 吕肖剑

责任编辑: 丁 俭

封面设计: 曾 斌

责任校对: 郭俐伽 张 静

责任技编: 何雅涛

出版发行: 中山大学出版社

电 话: 编辑部 020 - 84111996, 84113349, 84111997, 84110779

发行部 020 - 84111998, 84111981, 84111160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 编: 510275 传 真: 020 - 84036565

网 址: <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cbs@mail.sysu.edu.cn

印 刷 者: 广东省农垦总局印刷厂

规 格: 787mm × 1092mm 1/16 44.25 印张 1200 千字

版次印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08.00 元

如发现本书因印装质量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中国宋代文学学会第八届年会暨宋代文学与宋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合影留念

中国·赣州 2013年9月21日



第八届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合影留念

目 录

宋代文学研究的前沿问题

- 以文学与科举、党争、地域、家族、传播等学科交叉型专题为中心 王水照 (1)
- 域外汉籍中所见宋代江西诗派新资料及其价值 卞东波 (6)
- 日藏《全芳备祖》刻本时代考 程 杰 (19)
- 论《文苑英华》的碑志文及其类目 陈冠明 (26)
- 论南宋前中期的词坛风尚及尊体倾向 陈丽丽 (43)
- 试论“嘉祐四友”的进退分合与交游唱和 陈元锋 (50)
- 试论北宋文士对社会文化建设的贡献 崔际银 (64)
- 泛道德思维与政治文明发展的冲突

- 对欧阳修政治言论的重新考察 崔 铭 (72)
- 论周密词的都市书写与情感疏离 丁淑梅 (81)
- 南宋的多元文化与文学流派 邓乔彬 (89)
- 《绝妙好词》在清代的传刻与接受

- 兼论项氏笺注本与查氏笺注本的关系 邓子勉 (98)
- 南北乡心自不同

- 北宋词人贺铸与周邦彦的比较研究之一 符继成 (108)
- 宋代科举策问形态研究 方笑一 (118)
- 北宋“后湖居士”苏庠考 方星移 丁 新 (130)
- 欧阳修的经学与文学 巩本栋 (136)
- 论宋代文人的马少游情结 顾友泽 (155)
- 周密诗、词之考察 黄 海 (166)
- 论宋代帝王对俗词的接受 何春环 (174)
- 欧阳修的“和气”与“六一风神” 洪本健 (185)
- 南宋祠禄官制与地域诗人群体

- 以福建为中心的考察 侯体健 (197)
- 日课一诗论 胡传志 (207)
- 张炎词在清代的接受与清代词学的建构 黄浩然 (217)
- 黄庭坚《书磨崖碑后》的文化背景与文史互文 李 贵 (227)
- 论宋代馆驿诗的新变化 李德辉 (238)
- 从《养生说》诸篇看苏轼的生死观 李杰玲 (243)
- 论欧阳修的公文理论与写作实践 李黛岚 (249)
- 经典读本的选择与宋诗雅俗观 凌郁之 (257)

宋代字说考论	刘成国 (266)
宋词对琵琶乐妓的描写及其审美特征	刘尊明 (281)
论宋代江西文学家族联姻对家族文学的影响	黎清 (291)
论宋人对代名之使用与创造	罗宁 (299)
论朱熹的古文理论	马茂军 (315)
石介对儒家雅颂诗学传统的承继	马银华 (323)
论北宋名臣韩琦的诗歌	莫砺锋 (328)
宋代《贡举条式》的艺术渊源	钱建状 (338)
论辛弃疾《贺新郎》词的传播与接受	钱锡生 雷雯 (345)
杨万里与“诗债”	浅见洋二 (353)
日本学者内山精也的宋诗研究	邱美琼 (364)
论周紫芝其人及其诗	
——《周紫芝年谱》前言	任群 (372)
宋代花判新探	沈如泉 (382)
经典缺失的诠释与补亡	
——论宋人对“杜甫不赋海棠”的讨论与书写	沈扬 (390)
论唐宋词中的“生态意识”	宋秋敏 (399)
宋元之际士人阶层的分化与文学转型	沈松勤 (405)
宋初词坛沉寂原因新探	孙克强 (422)
论宋词“绝唱”	谭新红, 孙欣婷 (430)
“诗律伤严近寡恩”	
——论“小东坡”唐庚律诗之工	唐玲 (441)
基于诗人立场的批评	
——论刘克庄的诗学思想	王开春 (451)
宋诗总集三论	王友胜 (461)
论宋人以“集注”注诗	王德明 (468)
刘子翥纪事诗考论	王利民 (475)
期待视野的形成与失落	
——秦观“诗似小词”评价的接受学考察	王晓骊 (485)
北宋文人的地方流动及其影响论略	汪超 (494)
翁方纲论宋诗	吴中胜 (501)
《将赴兴国别同社五君子》之五君子考	徐海梅 (510)
《六州歌头·项羽庙》与北宋初年词坛生态	许芳红 (516)
文章学对古代小说文法论之影响	杨志平 (521)
朱熹《武夷棹歌》与朝鲜理学家李退溪的次韵诗	衣若芬 (532)
试论柳永及其词在宋金时期的经典化	郁玉英 (540)
王灼行年补考	岳珍 (549)
宋元词学批评中的词体体性论	岳淑珍 (553)
论苏轼诗学思想与书法理论的互通与互补	由兴波 (564)
唐稷生平思想考述	曾敏 (573)

“磬砂藏”与《三体唐诗》之流传	查屏球 (581)
观照：源于佛教的审美批评方式	张海沙 (596)
《贺圣朝·预赏元宵》的不同文本、作年和文本关系	张明华 (612)
宋人对白居易“池上”境界的仿慕及文学史意义	张再林 (617)
宋代诗学视阈中的以“鬼”论诗	张振谦 (625)
宋代“脚体”时文与元代“股体”时文	张祝平 (633)
从宋传奇看宋人的“女色”观	郑慧霞 (644)
从“意象”到“事象”：叙事视野中的唐宋诗转型	周剑之 (651)
苏轼与临济宗禅僧尺牍考辨	朱 刚 (661)
《全宋诗》误收唐诗考辩（下篇）	朱腾云 (668)
论帝王词作与尊体之关系	诸葛忆兵 (677)
吕本中“活法”说内涵生成的理学观照	左志南 (686)
中国宋代文学学会第八届年会暨宋代文学与宋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马国栋 王利民 (698)

宋代文学研究的前沿问题

——以文学与科举、党争、地域、家族、传播等学科交叉型专题为中心

王水照

复旦大学

近十多年来,中国的宋代文学研究取得了颇为突出的成绩,在视野的拓展、方法的探索、材料的挖掘、队伍的建设诸多方面都取得一定的进展。就当前中国古代断代文学研究来看,宋代文学研究应是其中最为活跃、最见成果的领域之一,展示出持续发展的乐观前景。学科交叉型专题研究的蓬勃兴起,就是引人注目的倾向。其中宋代文学与科举、党争、地域、家族、传播这五者之间关系的研究,均有多部研究专著问世,备受重视,并引起讨论,可喻为“五朵金花”(20世纪50年代中国历史学界争论的五个问题,当时被戏称为“五朵金花”)。这一研究方法打破了以往从文学到文学的单向研究的格局,发现不少曾被遮蔽或忽视的面相,提出值得深入探讨的新命题、新问题,便于从更广阔的大文化的全新视角上加深对宋代文学内涵的深入认识,有助于优化宋代文学研究的学理性建构,无疑是一大进步。

如科举对文学的作用,促进抑或促退,在20世纪70年代讨论唐诗繁荣原因时曾有过讨论,迄无定论。而在新出有关宋代科举的论著中,提出“两个层级”的分析方法,即“科举考试”与“科举制度”——前者对文学的作用多为负面,应试之诗文,往往阻遏创作活力;后者在读书习业、投文干谒、漫游邀誉乃至送行赠别、及第、落第等方面,则促成了诗文创作的发达。这种分析为这一聚讼纷纭的老问题,提供一个解决思路。考试科目中的各类文体的专题研究(如策论),也获得更充实的成果,甚至调整了传统的文学观念。两宋党争绵延不绝,对文人的文学创作影响深巨,尤对文风、士风的导向复杂纠葛,不少学者致力于此,作了深刻的揭示和论析。陈寅恪先生曾鲜明地提出过“地域一家族”的研究理念,用以具体考察唐代制度、政治与史学,这一观点成为他史学思想的核心之一。近来欧美学者也在这个专题上多有建树,关注于“地域性”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影响,尤其着重从“家族”的角度来研究“政治精英的转变”,都直接启示了宋代文学研究者的学术视角。目前,宋代文学家族的研究方兴未艾,比如晁氏家族、吕氏家族和临川王氏家族,皆有专著出版,其中晁氏家族的研究尤较充分。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考察宋代文学更是一大热点,武汉大学已俨然形成一个研究群体;关于宋词传播的方式、媒介、途径等方面,皆有新的开拓,如对男声演唱、单篇传播中的艺术媒介传播、词话和词籍序跋的传播功能、私人藏书和图书市场乃至驿递制度与传播的关系,均在文献搜集、实证研究和理论阐释上,取得很好的成绩。

学科交叉型专题研究的实践,丰富了已有的宋代文学研究成果,发现了更真实、更细致的文学图景,也有利于探讨宋代文学的一些发展规律,但似乎还需要关注以下三个问题,以求更好地达到通过学科交融来推进学术创新的目的。

一是坚持以文学为本位的原则。这里所谓的“学科交叉型专题”研究,乃指从家族、地域等学科背景上来研究宋代文学,它归根结底仍然属于文学研究,而不是建立一门独立的“文学家族学”或“文学地理学”等新学科,也不兼具什么文学学分支和家族学分支(或地

理学分支)的双重性质。拓展文学研究的外延不能导致削弱、偏离乃至湮没文学本身的地步。诚如一位西方学者所提醒,要警惕“文学研究者变成了业余的社会政治家、半吊子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忘记了作为一位文学史研究者的职责。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受到西方社会学研究的影响,我国宋代社会史的研究逐渐兴起,研究一个家族、一个地区的论文纷纷面世,这给宋代文学研究者不少启示和促进,随即也出现不少文学与家族、文学与地理方面的研究成果。其目的是简单而明确的:即为了改变研究视角,吸取和借鉴相关学科的学术成果和方法,开拓宋代文学研究的领域和视野。也就是说,进行交叉型专题研究是出于文学研究的需要,并不是追求不同学科之间的整合。比如金克木先生1986年发布的《文艺的地域学研究设想》一文,常被主张建立“文学地理学”的学者引以为据。其实,该文旨在提倡于习见的“历史的线性探索、作家作品点的研究”之外,应“扩大到地域方面”,其本意乃在强调时空合一的多“维”研究方法,纠正流行的、单一的纵向研究的局限,并没有要建立“文学地理学”独立学科的意思。但后来在刊物上出现了建立“文学家族学”“文学地理学”的呼吁(还未见公开提出建立“文学科举学”、“文学党争学”之类的口号),这就引发一些值得深入思考的新问题。

一般说来,一门学科的成立至少应该满足三个条件:一是它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其研究范围的内涵和外延具有排他性;二是它要建构起学科的学术体系,有一套完整的学科范畴、术语、概念,乃至独特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具有系统性;三是应有一定的学术成果和研究队伍作为基础支撑。从这些要求来看,目前的学术准备、积累和需要,似乎还不到去建立“文学家族学”“文学地理学”的时机。如果一旦真能建立起这两门独立学科,我当然也乐观其成。

宋代文学中的交叉型专题研究,当务之急还是回到最初的目标为宜,即从学科交叉处去努力发现一片新的风景——但必须是文学风景。

两宋涌现出众多的文化家族,其中具有鲜活的文学因素,具体描绘出建基在血缘关系之上,而又在家学、家风影响之下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呈现出真实的文学图景,应是研究这个课题的直接目的与方向。试以宋代词科设置、家族教育和骈文发展的关系作些说明。

宋代科举的科目设置历经变革,或重诗赋,或重策论,曾一度轻视对词章之才的选拔,朝廷文书质量大幅度下降。于是在宋哲宗绍圣元年始立“宏词科”(后又改称“词学兼茂”“博学宏词”),直至南宋末年,共录取107人,标准甚严而颇称得人。在这一百来人中,父子三人相继中试者有三人:陈宗台、陈贵谦、陈贵谊;兄弟三人相踵者有三洪:洪遵、洪造(后改名适)、洪迈;兄弟二人荣登者更多,计六组:二吴(吴玠、吴玠)、二滕(滕康、滕庾)、二李(李正民、李长民)、二袁(袁植、袁正功)、二莫(莫冲、莫济)、二王(王应麟、王应凤)。这一现象说明词科考试比起其他科目来,需要更广博的知识储备与严格的文辞训练,引导士子家庭作出针对性的应试反应,形成家学中某种专科化倾向,揭示出科举考试对形成家族文学特点的作用。这一现象还说明,南宋骈文的兴盛和繁荣与家族文学互为因果的关系,词科的制度设置,激发起士人社会和士人家族对四六文的重视和普遍肄习,在此基础上,三洪、二王以及周必大、孙觌、倪思、吕祖谦、真德秀等,均由词科出身而被称为四六名家,使南宋骈体文的成就足以与同时段的古文并肩。

二是真正打通文学学科和其他学科的交集点,善于借鉴其他学科的丰富成果,转换视角,开辟宋代文学研究的新境界。目前的有关论著,往往采取上下编的体例,先行论述其他

学科的情况（如宋代科举的起源、制度、运作过程），然后转入论述它和文学的关系及其影响，两者颇有割裂之感，俗称“两张皮”。交叉型专题研究的难点和关键点，在于真正揭示出两类事物之因果关系的真实面貌，这不是靠简单的现象类比、排列就可以奏效的，期待于学术同道长期艰苦的共同努力。这也是实现“以文学为本位”原则的具体化。

作家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总是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展开和完成的，以往的文学研究偏重于“时间”的维度，从某种意义上看，我们的文学研究整体的视角、方法、问题意识、学科方向无不处在文学史书写的笼罩之下。出于改变原有视角的迫切需要，文学与地理关系研究的提出立刻得到广泛的响应，在宋代文学研究中也是如此。深入发掘地域中的文学因素，无疑是值得期待的研究领域，可以大大拓展文学阐释的广阔空间。比如研究历史上作家的地理分布就是题中应有之义，前辈学者唐圭璋就有《两宋词人占籍考》等文。不少学者指出，不能仅止于作家的籍贯分布，而应关注籍贯地理以外作家的活动地理、作品描写地理、传播地理等方面，要特别注意“地理”之于“文学”的“价值内化”作用。也就是说，有两种地理，一是作为空间形态的实体地理，一是由文学家主体的审美观照后所积淀、升华的精神性“地理”。这一见解深化了“文”与“地”关系的认识。例如欧阳修占籍江西庐陵，自然产生了“江西情结”，但他生于四川，长于随州，以后宦游各地，最后退居颍昌，一生中仅因葬母回江西一次，因而“庐陵”对他的影响不算深刻。倒是他的初仕地洛阳，对他一生的思想与文学创作起了一锤定音的作用。他在洛阳参与以钱惟演为盟主的幕僚文人集团，从梅尧臣学诗歌，从尹洙学古文，对洛阳一批文友的悼念文字，是他“六一风神”散文主体风格的最初体现。洛阳之于欧阳修，已不是一个实体意义上的地理名词，而是他的一个永不消退的记忆场景，是他人生感悟的一种象征和符号。他不断地追怀洛阳亡友，持续地吟咏洛阳牡丹和绿竹，他可能再次回到洛阳，但永远回不到他心目中那个精神性的洛阳。对于具体作家的文学创作而言，上述有关籍贯的四个层次，其作用是不等量的，对于我们文学研究者而言，宜把注意力放在这类文学与地理的实质性的关键点上。

研究这个课题的学者，习惯于强调作家的故乡情结，甚至以此为基础概括出“某地域文学”或“某地域文学区”，我认为也值得斟酌。毫无疑问，中国古代文学具有显著的地域特征，在作家的地域分布和作品的地域流动上，有自己的特点和规律。但是，中国长期是一个统一的国家，遵奉的思想原则又基本一致，尤为重要的是使用统一的汉语言文字这一文学表达工具，因而能否从地域特征的基础上发展出真正独立意义上的“某地域文学”或“某地域文学区”，实在是“大体似有，定体则无”，处于疑似之间。不能把“地域文学区”与“地域文化区”这两个概念等同起来，后者植根于地域特有的历史传统、地理风貌、自然环境，以及地区的风俗习惯，尤其是方言的不同，作为“某地域文化区”是可以成立的，当然也要充分估计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各地域文化相互融合的一面。试看《诗经》与《楚辞》，原是中原文化和荆楚文化的两种代表，但在秦统一以后的发展中，日益为各地区作家所共同接受和学习，《楚辞》没有发展出独立的地域性荆楚文学，《诗经》更没有这种可能，它已上升为全民族文学共同遵奉的“经”了。充其量只能形成一定时期某地域的“文学中心”或“文学交往圈”，达不到“某地域文学”所应具备的独立性与完整性。

要之，文学是文化的一部分，地域对文学的影响，实际上主要是通过地域文化的中介而发生作用的。地域对文化的影响力与地域对文学的影响力，两者是不能等量齐观的。还应看到，某一地区的文学能否持续地保存和发展自己的特点，也需视实际情况而定。从中国古代文学发展而言，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地文学的地域特点存在着日渐趋同的倾向。程千帆先生

在评析刘师培名文《南北文学不同论》时指出：“刘君（师培）此论，重在阐明南北之始即有异，而未暇陈说其终则渐同。古则异多同少，异中见同；今则同多异少，同中见异。”（《文论十笺》）这是很敏锐的观察。近来出版的地区文学史，如《江西文学史》《福建文学史》等，数量众多，实际上只是该地区对本籍作家和客籍作家们创作的历史评述，尚未概括或提炼出该地区文学的显明的地域特色，似不能当做已然建立“文学地理学”的具体成果。

过分强调作家们的籍贯地理，有时还会遮蔽他们思想与创作的一些重要、真实的原貌。研究表明，北宋作家和南宋作家对于“故乡情结”有着明显的区别，北宋作家们固然不乏桑梓之恋，但他们随遇而安，四海为家，其最后的退居之地和卒葬之地往往不选择在故乡；而南宋作家们的家乡观念却要强烈得多，他们大都安土重迁，固守出生之地。受到“蜀人不乐仕宦”的传统影响，苏轼原也怀抱浓厚的西蜀乡土之恋，但在随后经历的三起三落、大起大落的人生波折中，他反而高唱“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海南万里是吾乡”的诗句，甚至说“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他的终焉之地在常州，墓葬在河南郟县，他的弟弟苏辙晚年退居颍昌，亦卒葬于郟县，与兄同地。苏轼还有卒葬于海南的打算，“死则葬于海外”，甚至说“生不挈棺，死不扶柩，此亦东坡之家风也”（《与王敏仲书》）。此外，如范仲淹葬于洛阳，不归苏州祖籍，欧阳修本意要埋于江西泅冈，最后还是在新郑安葬。其例甚多，使王士禛感叹宋世士大夫最讲礼法，但大都“仕宦卒葬，终身不归其乡”，实乃“不可解”之事（《香祖笔记》）。欲深入解答王士禛的疑问，便要涉及宋代的政治、社会背景，士人们的政治生态、现实诉求，好在现存可资佐证的文学作品是大量的，又有两宋士人不同的思想和创作选择可供参酌，是能够得出较为完满的答案的。王士禛的疑问无意中揭示出文学与地理关系的一个具体交集点，循此进行研究，可求“以文学为本位”的原则不致落空。

三是对文学研究中社会学化的倾向（如计量统计法）有所警觉，不能完全脱离文学研究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要注意从方法论上落实“以文学为本位”这一原则。层出不穷的图表统计，目眩神迷的数字泛滥，貌似科学的剖析毫末，有时并不能真正说明问题，反而是增添困惑。

武汉大学编纂的《宋词排行榜》《唐诗排行榜》问世后，引起热烈的争论。编者把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崔颢《黄鹤楼》分别列居宋词和唐诗的榜首，因而引发读者“炒作湖北”之质疑。编者们任职于武汉大学，苏词、崔诗均写于鄂地，但笔者认为这纯属巧合，实乃是编者依据自己所定标准所计量的统计结果，也无“炒作”的必要，他们真诚追求学术真理的尝试，是无可置疑的。透过激烈争辩之声，学者们自能发现一些未曾发现过的学术内涵：排行榜只是测定相关作品在历史行程中的关注度和影响力的大小，而不是评价入榜作品的艺术价值和思想意义的高低。它的意义在于一定程度上直观地揭示出历代的诗歌审美标准在不断改变，诗歌的潜在含义在不断地被发现，因而不失为一种研究手段。

然而，进一步推究这种研究手段，应该承认乃是部分地反映出文学学科传统研究方法与社会学计量统计方法的不同。以《宋词排行榜》为例，它在方法上明显借用计量统计法，一切用数据来判断，最终排出100首最具影响力的宋词的名次。据编者介绍，其数据主要来源于五个途径：一是选取宋元明清以来的宋词选本107种，用以统计每首词作的入选次数；二是互联网搜索引擎谷歌和百度所链接的关于宋词的网页数目；三是吴熊和《唐宋词话·两宋卷》中关于宋词的评点资料；四是20世纪有关宋词赏析和研究的单篇论文；五是依

据《全宋词》《全金元词》等历代词总集来统计历代词人追和宋人词作的篇数。整体设计还是颇费心思的。但结论是否科学、是否可以据信，却受到两方面的制约：一是现存文献的分布不均衡性。就以上述五个途径的材料而言，本身就是无法穷尽的，而能够搜集到的材料又具有不可避免的不平衡性，或较完备，或缺漏较多。如历代宋词选本这一项，在《宋词排行榜》的“五个途径”，即指标中，权重占50%，起着最重要的作用。但在选用的107种选本中，情况又千差万别：从时代来看，各代有各代的不同侧重；从选本性质上看，又有专家选本与普及性选本乃至两者结合的选本的差别。它们的思想倾向、主题诉求、艺术风格、审美爱好各不相同，要获得一个合理客观的平衡几乎是不可能的。二是对材料的采择选取很难避免主观性。比如对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在一般选本中受到青睐，自可理解，但像清末民初朱孝臧的《宋词三百首》，这首词在初编中虽被选入，但在“重编稿本”中却被删除，故现在通行本无此词。朱氏乃清末词坛四大家之一，他的这部词选以“浑成”为宗旨，并为所谓“重拙大”一派立帜树范。他对于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先取后删的态度，对于评估此词的“关注度和影响力的大小”具有特别的分量，显然不能跟其他一般选本等量齐观。新世纪以来，用“宋词三百首”为名的选本就有180余部，其中大多即是选用朱孝臧所编的《宋词三百首》中的词作书，可见其“关注度和影响力”至今不衰，但它与其他选本一样，也只是一票的权利。但这一富于学术价值的信息，在《宋词排行榜》中却无法得到反映。编者在《前言》中也举过朱氏此例，一时亦难有应对之策。

要之，由于现存文献分布的不均衡性，加上对材料选取的主观性，西方社会学所常用的计量统计方法的可信度是要打折扣的，未必优于从文献记载中直接分析所得的结论。诚如王兆鹏教授后来所说，在研究文学的传播与接受问题时，“应该注意两个结合、两个并重：实证研究与理论阐释相结合，传播、接受研究与创作、文本研究相结合；界内研究与跨界研究并重，基础理论与实务应用研究并重”（《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9月24日），这在方法论方面提出了十分重要而切实的原则。

域外汉籍中所见宋代江西诗派新资料及其价值

卞东波

内容摘要：江西诗派是宋代影响最大的诗歌流派，其二十五位诗人有一半以上没有文集存世，有些诗人仅有数首诗歌存世，但在域外汉籍中还保存着不少的江西诗派新资料，如《唐宋千家联珠诗格》中有两位江西诗人的佚诗，《续新编分类诸家诗集》则有十一位诗人的二十九首佚诗，为近年来发现的最大宗的江西诗派佚诗。域外汉籍除了有巨大的辑佚价值外，亦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联珠诗格》对入选的诗歌都有编者蔡正孙的评点，可与同时代方回《瀛奎律髓》的评点及刘辰翁的诗歌评点相并观。《联珠诗格》有朝鲜学者徐居正等人的增注，这些注释既释事又释意，是东亚学术史上最早的江西诗派诗歌的注释之作。日本汉籍宇都宫由的的《锦绣段详注》及佚名的《续锦绣段抄》中有十数首江西诗派诗歌的注释，注释详而精审。总之，这些域外汉籍中所见的江湖诗人新资料，可以丰富我们对江西诗派的认知。

关键词：江西诗派 域外汉籍 《续新编分类诸家诗集》 《锦绣段首书》
《续锦绣段抄》

江西诗派是宋代最有影响也是最有代表性的诗歌流派，其影响从北宋中后期一直持续到晚宋，甚至到晚清还余韵袅袅。文学史上对江西诗派的评价与宋诗地位升沉起伏息息相关，在宋诗受到贬斥时，江西诗派也必然受到批评。随着宋代文学研究的深入以及宋诗研究的升温，江西诗派的研究也日益成为学术界的热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学术界越来越重视江西诗派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的专著和论文，取得了很大的进展^①。但江西诗派研究的突破，受制于有关江西诗派文献的有限，故对其的研究也只能集中在黄庭坚、陈师道等大家上，而对其他诗人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推进，这就需要从更广阔的视野下发掘有关江西诗派的新资料。江西诗派二十五位诗人中，有一半以上的诗人没有留下文集。笔者曾在陈起所编的《圣宋高僧诗选》中发现江西诗派诗人释善权的多首佚诗^②，近来笔者又在域外汉籍中发现数十首江西诗派诗人的佚诗，同时域外汉籍中还有不少江西诗派诗歌的注释，这可能是除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之外，东亚学术史上对江西诗人最早的研究。

① 有关江西诗派的研究，参见傅璇琮编《黄庭坚和江西诗派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78年版）、龚鹏程《江西诗社宗派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84年版）、莫砺锋《江西诗派研究》（齐鲁书社1986年版）、伍晓蔓《江西宗派研究》（巴蜀书社2005年版）、韦海英《江西诗派诸家考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王琦珍《黄庭坚与江西诗派》（江西高校出版社2006年版）、黄启方《黄庭坚与江西诗派论集》（国家出版社2006年版）。

② 卞东波：《南宋诗选与宋代诗学考论》第四章《陈起〈圣宋高僧诗选〉丛考》，中华书局2009年版。

宋人于济、蔡正孙（1239—？）合编的唐宋诗歌总集《唐宋千家联珠诗格》二十卷是一部大型的唐宋诗歌总集，共收唐宋时代600多位诗人1000多首七言绝句，这其中入选江西诗派诗人黄庭坚（十九首）、陈师道（七首）、陈与义（十四首）、韩驹（三首）、徐俯（一首）、晁冲之（一首）、谢逸（二首）、谢薖（一首）、林敏修（一首）、释祖可（二首）十位江西诗派诗人五十一首诗，其中谢逸、林敏修各有一首佚诗。《联珠诗格》最大的价值在于，每一首诗都有蔡正孙的评点，这些评点可与同时代方回《瀛奎律髓》的评点以及刘辰翁的唐宋诗歌评点相辉映，是研究宋元之际诗学批评的新资料。中国古代的诗歌评点肇始于宋元之际，方回《瀛奎律髓》之评长似一则诗话，因为方回笃信江西诗派的诗学，其论诗兼具艺术评鉴、历史批评及理论阐发；蔡正孙与刘辰翁的评点短而有味，多从艺术鉴赏与写作技巧的角度出发，如《联珠诗格》卷二评陈师道《东禅》第二句云：“下字精切。”指出此句在用字上精致而恰切。卷一评陈与义《次韵》首联云：“句法、字面皆不俗。”同卷评黄庭坚《呈孙莘老》首联云：“二句对得老成，山谷诗之妙处。”卷一六陈与义《赋诗亭》首联亦云：“对联老成。”蔡正孙曾经与诗友组织过诗社，蔡正孙的诗学批评比较重视诗歌的技巧层面，如下字、句法、对偶等，很可能与诗社的活动有关^①，也可能与《联珠诗格》接受的对象是蒙童有关，这从一方面显现出晚宋诗学中世俗化的一面。不过蔡评也有部分历史批评，对所评之诗能知人论诗，如《联珠诗格》卷一二评陈师道《题柱》一诗：

桃李摧残风雨春，天孙河鼓隔天津。托兴谓桃李则有风雨之摧，牛女则有天河之隔。

主恩不与妍华尽，何限人间失意人。后山少贫，不得志，以东坡荐为徐州教，复被论罢。此诗因写其志。

陈师道这首诗所用意象，如“桃李”等有明显的托寓意味，任渊《后山诗注》卷五有此诗之注，阐释了诗中的典故，仅在最后一个注说：“士不遇多矣，何独女子哉。”亦没有将其与陈师道的个人际遇结合起来，蔡评提供的历史语境对理解此诗帮助更大。

《联珠诗格》在元代以后就从中国本土失传，但一直在古代朝鲜和日本流传，目前仅有朝鲜版与和刻本存世。此书在朝鲜和日本非常流行，朝鲜学者徐居正（1420—1488）等人还在蔡评的基础上，对该书的每首诗做了补充注释，编成《联珠诗格增注》一书，这其中就有对五十一位江西诗人诗歌的注释，这是东亚学术史上最早，也是比较集中地对江西诗派诗歌的研究。徐居正是朝鲜时代著名的学者，曾经编纂过《东文选》，也著有朝鲜历史上最早的诗话《东人诗话》，他对中国诗学非常熟悉^②，所以他领衔注释，使这部增注在学术上取得很大的成绩，即使从今日古籍整理的眼光来看，也是非常出色的。下面以《联珠诗格》卷六陈师道《自况》一诗增注为例：

^① 参见卞东波《南宋诗选与宋代诗学考论》第八章《〈唐宋千家联珠诗格〉与宋代诗学》中《吟社中的诗学》一节。

^② 参见张伯伟《〈东人诗话〉与宋代诗学——以文献出典为中心的比较研究》，《域外汉籍研究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9～126页。

自况^{增注}况，比拟也。后山尝作二绝句以自况，此其一也。其一绝云：“春风永巷闭娉婷，长使青楼误得名。不惜卷帘通一顾，怕君着眼未分明。”陈后山

当年不嫁惜娉婷，^{增注}李山甫诗：“当年未嫁还忧老。”杜诗：“不嫁惜娉婷。”娉，滂丁切。婷，达丁切，美好也。傅白施朱作后生。^增宋玉对楚王曰：“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东家之子者。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说与旁人须早计，^{增注}《庄子》：“且汝亦太早计。”随宜梳洗莫倾城。后山此诗，山谷云：“顾影徘徊，眩耀太甚。”^{增注}李延年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此诗后山以处子自比，言少时不轻许人，自惜美好。今则衰矣，唯事脂粉，以作后生。寄语旁人，宜须早计，不必极妍，以至于倾城也。盖比士生斯世，当早图立身，不可虚度日月，以至于失时也。元丰间，曾南丰修史，荐后山有道德，有史才，乞自布衣召入史馆。命未下，而曾已去。后山感其知己，作《妾薄命》二首，以自悲，盖亦此诗之意。

任渊《后山诗注》未注此诗。从蔡评可见，后山的同时人，如黄庭坚似乎对此诗也有微词（原始出处见《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十一引《王直方诗话》），可见山谷亦不能洞悉后山内心之苦楚。但我们看《增注》，不但将此诗中的语典解释得清清楚楚，而且还有一段很长的诗意解说，将此诗的历史背景以及后山的寄托之意全部阐释出来，深得后山之心曲。这也是徐居正等人《增注》的特色，即重视文本字义、典故疏通的同时，也注重诗意的阐发。再如卷六解释陈与义《墨梅》“粲粲江南万玉妃，别来几度见春归。相逢京洛浑依旧，唯恨缁尘染素衣”云：“粲粲玉妃，状梅本色；缁尘染素，状墨梅。言曾于江南粲粲然矣，今相别几岁，而乃在京华变成缁也。”卷一六解释黄庭坚《答送菊》“病来孤负鸛鹑杓，禅板蒲团入眼中。浪说闲居爱重九，黄花应笑白头翁”云：“此诗言，我病不饮，以负酒杯，便似坐禅，禅板、蒲团已入于眼中矣。凡人浪说闲人爱九日也，然我则虽闲而不饮菊，必笑我老翁之衰白也。”虽然都比较简洁，但也将诗意串讲得非常清楚。

我们再比较一下黄庭坚《呈孙莘老》一诗的任渊之注与徐居正等人的增注，可以看出两者的不同特色：

任渊《山谷内集诗注》卷十	《联珠诗格增注》卷十一
九陌黄尘乌帽底，五湖春水白鸥前。《三辅旧事》曰：“长安城中，八街九陌。”退之诗：“子云只自守，奚事九衢尘。”又诗：“虽有九衢无尘埃。”《乐府·读曲歌》曰：“不知乌帽郎是谁。”《越语》曰：“范蠡遂乘轻舟，以泛于五湖。”老杜诗：“时危兵甲黄尘里，日短江湖白发前。”此颇用其语律。扁舟不为鲈鱼去，收取声名四十年。《晋书·张翰传》：齐王同辟为掾，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志，何能羁官数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驾而归。俄而同败，人谓见几。老杜诗：“夫子独声名。”又赠郑虔诗：“才名四十年。”	九陌黄尘乌帽底，五湖春水白鸥前。二句对得老成，山谷诗之妙处。^{增注}《三辅旧事》：“长安城中，八街九陌。”乐府：“不知乌帽郎是谁。”扁舟不为鲈鱼美，收取声名四十年。非役志于功名者。^{增注}杜诗：“夫子独声名。”又“才名四十年”。○元祐三年九月，莘老以御史中丞提举醴泉观，寻以疾，坚请外，提举舒州灵仙观。山谷喜莘老得归，作此诗。言名宦者奔走于尘埃，散逸者自得于江湖，今辞名宦而就江湖。扁舟而去者，岂为鲈鱼口业之所使，盖收取四十年之功名，而欲自全之也。

从以上的比较可见，任渊注基本上遵从江西诗派所说的“无一字无来历”理论，以释事为主，努力找到黄诗每一个典故的出处。《增注》在注释上几乎本于任注，但最后有一段比较长的诗意阐释，将此诗的背景以及诗歌大意都解释得非常清楚。这固然也是为了适应朝鲜读者的需要，但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更需要释事又释意，所以《增注》中的这些注释在今天其意义仍不可忽视。

《联珠诗格》保存了约300首宋人佚诗^①，其中就收有江西诗派诗人谢逸与林敏修各一首佚诗，现将两诗、蔡注及增注辑录如下：

梅花 谢无逸

约束幽香夜闭关，**增注**关以木横持门户也。《易》：“至日闭关。”斩新霜露玉肌寒。

下语尖新。**增注**东坡诗：“斩新一朵含风露。”莫教醉里风吹尽，留取醒时子细看。此联有工部诗体。**增注**教，平声，使之为也。杜诗：“更把茱萸仔细看。”○此言爱梅之幽香，而约束之，当夜闭门，使不得放过。其梅之霜露玉肌斩新而寒矣，第恐醉里造次之间，风吹零谢，故曰“莫教吹尽”也。“留取醒时子细看”者，盖爱梅之至，不容易醉赏而欲待醒时子细看也。老杜云：“不如醉里风吹尽，可忍醒时雨打稀。”此诗翻一转意。○杜诗：“斩新花蕊未忘飞。”（卷五）

砚屏 林子来

露苇霜荷落晚风，数行归雁下秋空。此是描写屏间所作景物。何人收拾江湖景，都在明窗净几中。见得是砚屏。**增注**东坡诗：“赖有高楼能聚远，一时收拾与闲人。”谢叠山诗：“明窗净几有宿契。”○此言苇也、荷也、雁也，皆江湖之景，而移画砚屏间也。（卷四）

谢逸（1068—1112），字无逸，号溪堂居士，临川（今属江西）人。《直斋书录解題》卷十七著录：“《溪堂集》二十卷，临川谢逸无逸撰。”又《直斋书录解題》卷二〇著录：“《溪堂集》五卷，补遗二卷，临川谢逸无逸撰。”原集已佚，清四库馆臣据《永乐大典》辑为《溪堂集》十卷（其中诗五卷）。《全宋诗》卷一三〇七一—一三一二录其诗六卷。《四库全书总目》称其诗“虽稍近寒瘦，然风格隽拔，时露清新”^②。林敏修，字子来，号漫郎，蕲春（今属湖北）人。《直斋书录解題》卷二〇著录其有《无思集》四卷，已佚。《全宋诗》卷一〇七四录其诗九首。

蔡正孙的评点仍以技巧分析为主，如评谢逸“斩新霜露玉肌寒”一句云：“下语尖新。”所谓“尖新”是蔡正孙经常使用的批评术语，意为用语新颖深刻。徐居正等人的增注的学术性很强，对这两首诗的注释皆能引用唐宋诗人的诗歌来彰显这两位江西诗派诗人诗歌的诗学渊源，如谢逸之诗的第二联，蔡评仅云“此联有工部诗体”，而增注则详引杜甫原诗以证其句法来源。又引杜甫另一首诗，指出韩驹此诗是对杜诗的翻案：“此诗翻一转意。”于斯可见，江西诗派诗人虽以杜甫为祖，但并不完全对杜甫亦步亦趋。另外，《增注》对两诗的诗意解释，亦清通简要。

① 参见下东波《〈唐宋千家联珠诗格〉中〈全宋诗〉佚诗辑考》，载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编《古典文献研究》第八辑，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

②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五“《溪堂集》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第1338页。

总之，域外汉籍《联珠诗格》及其增注不但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同时在江西诗派诗歌的评点以及诗意阐释方面都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值得今天的学者加以利用。

二

日本镰仓（1185—1333）与室町时代（1338—1573），当时的五山禅僧为了研习中国古典文学，编纂了一些适合日本禅僧口味的中国诗歌总集，其中规模较大的是江西龙派（1375—1446）所编的《新选分类集诸家诗卷》（下简称《新选》）及慕哲龙攀（？—1424）、瑞岩龙惺（1384—1460）所编的《续新编分类诸家诗集》（下简称《新编》）。江西龙派，号木蛇、续翠，又号晚泊老人等，为日本临济宗黄龙派僧，曾为京都建仁寺、南禅寺住持。著有《江湖风月集》的注释《江湖抄》，苏轼诗的注释《天马玉津沫》以及杜甫诗的注释《杜诗续翠抄》^①。他所编的《新选》分为19类，共收诗1200余首。慕哲龙攀亦为临济宗黄龙派僧侣，与江西龙派同师建仁寺名僧一麟一庵（1329—1407），后亦为建仁寺之主持^②。瑞岩龙惺，别号蝉庵（蝉闇）、稻庵，临济宗黄龙派僧。亦从一麟一庵问学，又从法兄江西龙派、慕哲龙攀学习诗文，后为建仁寺、南禅寺主持，著有《蝉闇稿》^③。《新编》分为25类，共收诗约1300首。这两部总集在日本从来就没有刊刻过，仅以抄本形式存世，此两书具有极大的文献价值。这两部总集共选了中国唐至明数百位诗人的2500多首诗，其中宋诗最多，这其中就有约三十首中国文献未见的江西诗派诗人佚诗。这些佚诗全部收录于《新编》中，《新选》未录，下文括号中标注该诗在原书中所属类别。

林敏功二首

送梅花赠蒲元礼

官梅虽近有谁知，渠共诗人似有期。记得去年携酒处，竹间初折半斜枝。（草木）

探梅

庾岭经由九月时，南人已说探梅迟。江淮地冷君休笑，岁岁清香雪压枝。（草木）

按：林敏功，字子仁，蕲春（今属湖北）人。哲宗元符末诏征不赴，与弟敏修以文字终老，世号“二林”。徽宗政和中，他被赐号高隐处士，著有《蒙山集》《高隐集》七卷，已佚。《全宋诗》卷一〇七四录其诗八首，上两诗未收。

林敏修一首

乞金沙

梦里春归总不知，金沙压架尚低欹。晓来风恶应飘尽，分我红香一两枝。（草木）

① 江西龙派生平参见上村观光编《五山诗僧传》，东京民友社1912年版，第201～203页；又参见玉村竹二《五山禅僧传记集成》，东京讲谈社1983年版，第220～221页。

② 慕哲龙攀生平参见上村观光编《五山诗僧传》，第207页；又参见玉村竹二《五山禅僧传记集成》，第592页。

③ 瑞岩龙惺生平参见上村观光编《五山诗僧传》，第217～219页；又参见玉村竹二《五山禅僧传记集成》，第339～341页。